



王國平 主編

南宋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系列叢書

古籍整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

【宋】李心傳撰 辛更儒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國平 主編

南宋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系列叢書

古籍整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

〔宋〕李心傳撰 辛更儒點校



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

《南宋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系列叢書》

編撰指導委員會

主 任 王國平

副主任 葉 明 翁衛軍 顧樹森 張鴻建

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水照 方建新 史及偉 阮重暉 朱瑞熙
何忠禮 沈 翔 李裕民 汪聖鐸 辛 薇
周 膺 徐吉軍 陳智超 孫 璐 張旭東
曹家齊 楊志毅

《南宋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系列叢書》

編輯委員會

主 編 王國平

執行主編 沈 翔 何忠禮

執行副主編（以姓氏筆畫為序）

方建新 范立舟 周 膺
徐吉軍 孫 璐 張旭東

編撰辦公室工作人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尹曉寧 李 輝 魏 峰

序言

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建炎元年（一一二七）五月初一日，宋徽宗第九子、欽宗之弟趙構在應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重建宋政權。不久，宋高宗在金兵的追擊下一路南逃，最終在杭州站穩了脚跟，並將此地稱爲「行在所」，成爲實際上的南宋都城。

南宋自立國起，到最終爲元朝滅亡（一二七九），國祚長達一百五十三年之久。對於南宋社會，歷來評價甚低，以爲它國力至弱，君臣腐敗，偏安一隅，一無作爲。但是近代以來，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史學家却有不同看法，如著名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指出：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①。

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更認爲：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②。

很顯然，對宋代的這種高度評價，無論是陳寅恪還是鄧廣銘先生，都沒有將南宋社會排斥在外。我以爲，一些人所以對南宋貶抑至深，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患有「恐金病」的宋高宗和權相秦檜一伙倒行逆施

的義憤，同時從南宋對金人和蒙元步步妥協，國土日蹙月削，直至滅亡的歷史中，似乎也看到了它的懦弱和不振。當然，缺乏對南宋史的深入研究，恐怕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衆所周知，南宋歷史悠久，國土雖只及北宋的五分之三，但人口少說也有五千萬人左右，經濟之繁榮，文化之輝煌，人才之衆多，政權之穩定，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偏安政權所不能比擬的。因此，對南宋社會的認識，不僅要看到它的統治集團，更要看到它的廣大人民群眾；不僅要看到它的軍事力量，更要看到它的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等各個方面，看到它的人心之所向。特別是由於南宋的建立，才使漢唐以來的中華文明在這裏得到較好的傳承和發展，不至於產生大的倒退。對於這一點，人們更加不應該忽視。

北宋滅亡以後，由於在淮河、秦嶺以南存在着南宋政權，才出現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再一次給中國南方帶來了充足的勞動力、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生產經驗，從而推動了南宋農業、手工業、商業和海外貿易的顯著的進步。

與此同時，南宋又是中國古代文化最爲光輝燦爛的時期。它具體表現爲：

一是理學的形成和儒學各派的互爭雄長。

南宋時候，程朱理學最終形成，出現了以朱熹爲代表的主流派「道學」，以胡安國、胡宏、張栻爲代表的「湖湘學」，以譙定、李燾、李石爲代表的「蜀學」，以陸九淵爲代表的「心學」。此外，浙東事功學派也在尖銳複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形勢下崛起，他們中有以陳傅良、葉適爲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唐仲友爲

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爲代表的「金華學派」。理宗朝以前，各學派之間互爭雄長，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二是學校教育的大發展，推動了文化的普及。

南宋學校教育分中央官學、地方官學、書院和私塾村校，它們在南宋都獲得了較大發展。如南宋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僅參加中央太學補試的士人就達三萬七千餘人，約爲北宋熙寧初的二百五十倍^③。州縣學在北宋雖多次獲得倡導，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兩宋共有書院三百九十七所，其中南宋占三百十所^④，比北宋的三倍還多，著名的白鹿洞、象山、麗澤等書院，都是各派學者講學的重要場所。爲了適應科舉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鄉。學校教育的大發展，有力地推動了南宋文化的普及，不僅應舉的讀書人較北宋爲多，就是一般識字的人，其比例之大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高峰。

三是史學的空前繁榮。

通觀整個南宋，除了權相秦檜執政時期，總的說來，文禁不密，士大夫熟識政治和本朝故事，對國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責任感，不少人希望藉助於史學研究，總結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以供統治集團作爲參考。另一方面，南宋重視文治，讀書應舉的人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對史書的需要量極大，許多人通過著書立說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許多人將刻書賣書作爲謀生的手段。這樣就推動了南宋史學的空前繁榮，流傳下來的史學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過了北宋一代，南宋史家輩出，他們治史態度之嚴肅，考辨之詳瞻，一直爲

後人所稱道。四川、兩浙東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都是重要的史學中心。四川以李燾、李心傳、王稱等人爲代表。浙東以陳傅良、王應麟、黃震、胡三省等人爲代表。江南西路以徐夢莘、洪皓、洪邁、吳曾等人爲代表，福建路以鄭樵、陳均、熊克、袁樞等人爲代表。他們既爲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史料，也創立了新的史學體例，史書中反映的愛國思想也對後世史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是公私藏書十分豐富。

南宋官方十分重視書籍的搜訪整理，重建具有國家圖書館性質的秘書省，規模之宏大，藏書之豐富，遠遠超過以前各個朝代。私家藏書更是隨着雕板印刷業的進步和重文精神的倡導而獲得了空前發展。兩宋時期，藏書數千卷且事迹可考的藏書家達到五百餘人，生活於南宋的藏書家有近三百人^⑤，又以浙江爲最盛，其中最大的藏書家有鄭樵、陸宰、葉夢得、晁公武、陳振孫、尤袤、周密等人，他們藏書的數量多達數萬卷至十數萬卷，有的甚至可與秘府、三館等。

五是文學、藝術的繁榮。

南宋是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繁榮昌盛的時代。詞是兩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形式，據唐圭璋先生所輯全宋詞統計，在所收作家籍貫和時代可考的八百七十三人中，北宋二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南宋六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四，李清照、辛棄疾、陸游、姜夔、劉克莊等都是南宋杰出詞家。宋詩的地位雖不及唐代，但南宋詩就其數量和作者來說，却大大超過了北宋。由北方南移的詩人曾幾、陳與義，有「中興四大

詩人」之稱的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尤袤；有同爲永嘉（浙江温州）人的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有作爲「江湖派」代表的戴復古、劉克莊；有南宋滅亡後作「遺民詩」的代表文天祥、謝翱、方鳳、林景熙、汪元量、謝枋得等人。此外，南宋的繪畫、書法、雕塑、音樂舞蹈以及戲曲等，都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南宋的民俗風情，宗教思想，乃至衣、食、住、行等方面，對今天的中國也有着深刻影響。

南宋亦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史上最爲輝煌的時期，正如英國學者李約瑟所說：「對於科技史家來說，唐代不如宋代那樣有意義，這兩個朝代的氣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義的，而宋代較著重科學技術方面……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⑥此話當然一點不假，不過如果將南宋與北宋相比較，李約瑟上面所說的話，恐怕用在南宋會更加恰當一些。

首先，中國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即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而言，在南宋都獲得了比北宋更大的進步和更廣泛的應用。別的暫且不說，僅就將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上，並製成爲羅盤針使用這一點來看，它就爲中國由陸上國家向海洋國家的轉變創造了技術上的條件，意義十分巨大。再如，對人類文明有重大貢獻的活字印刷術雖然發明於北宋，但這項技術的成熟與正式運用却是在南宋。其次，在農業、數學、醫藥、紡織、製瓷、造船、冶金、造紙、釀酒、地學、水利、天文曆法、軍器製造等方面的技術水平都比過去有很大進步。可以這樣說：在西方自然科學東傳之前，南宋的科學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封建社會科學技術的最高

水平。

南宋軍事力量雖然弱小，但軍民的鬥爭意志却異常強大。公元一二三四年，金朝爲宋蒙聯軍滅亡以後，宋蒙戰爭隨即展開。蒙古鐵騎是當時世界上最爲強大的軍隊，它通過短短的二十餘年時間，就滅亡了西夏和金，在此前後又發動三次大規模的西征，橫掃了中亞、西亞和俄羅斯等大片土地，前鋒一直打到中歐的多瑙河流域。但面對如此勁敵，南宋竟頑強地抵抗了四十五年之久，這不能不說是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迹。從中湧現出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反映了南宋軍民不畏強暴的大無畏戰鬥精神，他們與前期的「岳飛精神」一樣，成爲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古人有言：「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近人有言：「古爲今用，推陳出新。」前者是說，認真研究歷史，可爲後人提供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以少犯錯誤；後者是說，應該吸取歷史上一切有益的東西，通過去粗取精，改造、發展，以造福人民，總之，認真研究歷史，有利於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也有利於將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和諧的、幸福的社會。我覺得南宋可供我們借鑒反思和保護利用的東西實爲不少。

以前，南宋史研究與北宋史研究相比，顯得比較薄弱，但隨着杭州市社會科學院主持的五十卷南宋史研究叢書編撰出版工作的基本完成，這一情況發生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改變。但歷史研究沒有窮盡，關於南宋和南宋都城臨安的研究，尚有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也還有一些空白需要填補。近日，欣聞杭州市社會科學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擬進一步深化和擴大南宋史研究，同時出版「博士文庫」，加強對南宋史研究後備人

才的培養，對杭州鳳凰山皇城遺址綜保工程，也正從學術上予以充分配合和參與，此外還正在點校和整理部分南宋史的重要典籍。組織編撰南宋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系列叢書，對於開展以上一系列的研究，我認為很有意義。我相信，在汲取編撰南宋史研究叢書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新的系列叢書一定會進一步推動我國南宋史研究的深入開展，對杭州乃至全國的精神文明建設都有莫大的貢獻，故樂為之序。

徐 規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於杭州市道古橋寓所

①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二〇〇一年出版。

② 鄧廣銘：關於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載社會科學戰綫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③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三九，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影印本。

④ 參見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十集，第一一一至一一五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三〇年出版。

⑤ 參見中國藏書通史第五編第三章宋代士大夫的私家藏書，寧波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出版。

⑥ 中國科學技術史導論中譯本，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

點校前言

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宋李心傳撰，是記載南宋高宗朝中興三十六年歷史的一部著名編年體史書。

作者李心傳（一一六七——一二四四），字微之，號秀巖野人，霅濱病叟，成都府路隆州井研人。其父李舜臣，曾任宗正寺簿，以文名。三子，「性傳、道傳、心傳」，皆以家學顯，世有陵陽李氏、東窗李氏、井研李氏之稱，褒然爲一代儒宗^①。

李心傳受家學傳承和影響，自少年時期開始，即決心以繼承和發揚宋代史學爲平生志願。他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序中寫道：

心傳年十四五時，侍先君子官行都，頗得竊窺玉牒所藏金匱石室之副，退而過庭，則獲剽聞名卿才大夫之議論。每念渡江以來，紀載未備，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將之行事猶鬱而未彰。至於七十年間，兵戎財賦之源流，禮樂制度之因革，有司之傳，往往失墜，甚可惜也。

李心傳十四歲爲淳熙七年（一一八〇），其父李舜臣於行在所任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故李心傳得以在行在「竊窺玉牒所藏金匱石室之副」，爲日後所撰史著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寫作，在李心傳居喪期間，就已經付諸準備，不久便開始了正式的撰著。^②

據此書前幾卷中文句，大致可以考證李心傳開始寫作要錄的年代。如此書卷一追述重和元年（一一一八）夏記事有云：「詔武義大夫馬政與其子承節郎廣，及平海軍指揮使呼延慶航海往使。」馬廣後有注：「字犯御名，今改。後準此。」按：馬廣原名馬擴，宋寧宗名擴，即位後擴字因避諱，皆改爲他字。這似乎表明，此書之寫定，必在寧宗在位期間。而此書卷三載靖康元年（一一二六）三月癸丑，馮澥歸自金營條，有「秘書著作佐郎沈晦、鴻臚寺主簿鄧肅亦因得歸。……晦，文通孫。」其後作者有注：「文通，錢塘人。治平中翰林學士，名犯太上嫌名。」沈晦，宋史無傳，而其祖父沈邁字文通，因犯宋高宗趙構嫌名，故要錄以字代其名。作者在此注中提及高宗，謂之太上，不及其廟號。宋高宗淳熙十四年十月逝世，明年三月上謚號、廟號，此處不稱高宗，而謂之太上，不知是否表明其時尚還在宋孝宗的淳熙末年^③。

宋寧宗慶元元年（一一九五），李心傳以明經薦於鄉，明年試進士則不利，遂絕意不復應舉，閉門著書。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之撰寫，當皆正式開始於明年考試罷黜之後。而至嘉泰二年（一一二〇）冬，雜記甲集撰成，又五六年，繫年要錄遂告完成，經臣僚奏請，有旨給札，宣取繫年要錄淨本投進。其時，李心傳尚在壯年。

李心傳於宋理宗寶慶二年（一二二六），以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前後二十三人薦舉，布衣補官，召入史館，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未及成書而罷。後又添差通判成都府，於端平元年（一二三四）除著作

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踵修十三朝會要，三年書成。召赴闕，任工部侍郎，以言者罷，居湖州。

李心傳平生著述甚多，宋史卷四三八本傳記載有專著十一種，文集一百卷，今所存者，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外，還有舊聞證誤、道命錄、丙子學易編等。

二

宋代南渡以後學者，切身感受到中原淪喪的痛苦，萌生總結歷史教訓的責任心，激發撰寫本朝歷史的積極性，形成了當代人撰寫當代史的優良傳統。李燾撰寫續資治通鑑長編，熊克撰寫中興紀事本末，而李心傳撰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都是以薈萃朝野見聞，形成一朝大典爲其宗旨的。

李心傳在本書卷一追述靖康之變的禍起之源，曾有「政和七年（一一一七）春，尚書司封員外郎陶悅使遼而歸。……悅，節夫子」的記載，并在注語中寫道：

節夫，宣和間爲龍圖閣學士，應姓名已見建隆以來繫年要錄者，此不別出。

陶節夫是北宋人，故首次出現應在北宋史中。我以爲，這一建隆以來繫年要錄的書名，作者特在此隆重拈出，實在是開宗明義地表明，李心傳在寫作南宋高宗中興歷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之初，就已經爲自己製訂了編寫北宋開國至南宋時期全部歷史的宏偉計劃，他首先開始寫作的是中興第一朝的歷史，然而他並不僅僅只想完成高宗朝歷史爲止。其時正當南宋第四代皇帝寧宗即位的第一個十年。此書有的抄寫者不知李心

傳的計劃，故往往把「建隆以來」改爲「建炎以來」，一字毫釐之差，已經謬以千里。另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附幾件宣取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指揮看^④，李心傳在完成本書後，還曾繼續撰寫孝宗朝、光宗朝繫年要錄，孝宗朝且已完成，只因蜀地爲南侵的蒙古軍攻取而致喪失，故此無傳。而北宋的繫年要錄則未及撰寫作者便去世了。

由此看來，李心傳計劃中的北宋歷史可總稱爲建隆以來繫年要錄，而中興以後各朝歷史則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爲名，其中各朝史前則冠以某朝字樣，故嘉定三年宣取本書時稱之爲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因宋高宗重建南宋政權，類似於光武重建東漢，故高宗朝又被當時人們視爲宋朝中興，涉及這段歷史的書籍又往往冠以中興之名，所以高宗繫年要錄又被稱作皇朝中興繫年要錄。這是歷經元明而至清初未曾改變的。所以，當清乾隆間開四庫全書館，薈萃歷代書籍，從永樂大典中輯錄本書時，四庫館臣經過審慎思索，還是根據永樂大典的題名，以及李心傳朝野雜記的自序，把宋中興歷朝史的總名定爲高宗一朝史的書名，而不用高宗朝或中興的字樣，以避免混淆朝代，這是十分確當的。

四庫館臣還撰寫了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提要，對此書的體例、流傳、學術價值、是非評價及書名等有關問題作了扼要的說明和考證。其中涉及此書體例內容和學術價值有云：

是書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跡，仿通鑑之例，編年繫月，與李燾長編相續。……

其書以國史、日曆爲主，而參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狀、案牘奏議、百司題名，無不臚採異同，以待後

來論定。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論雖歧而不病其雜，在宋人諸野史中，最足以資考證。

宋史本傳稱其重川蜀，而薄東南。然如宋人以張栻講學之故，無不堅持門戶，爲其父張浚左袒。心傳獨於淮西、富平之債事，曲端之枉死，岳飛之見忌，一一據實直書，雖朱子行狀，亦不據以爲信，初未嘗以鄉曲之私，稍爲回護。則宋史之病是書者，殆有不盡然矣。大抵李燾學司馬光，而或不及光；心傳學李燾，而無不及燾。其宏博而有典，要非熊克、陳均諸人所能追步也。^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書，表面上看，雖然與續資治通鑑長編分述南北宋歷史，但其自成體系，原意是要自北宋太祖建隆元年起始寫起，下至李心傳生存的時代，成一代之信史。其編年繫月，乃以資治通鑑爲效仿的典範，却并非續資治通鑑長編的續編。館臣的理解，稍有差誤。

高宗一朝的繫年要錄，李心傳著述的主要依據，在官史中主要是當時已經編寫完成的高宗皇帝日曆。其次才是中興會要。據裴汝誠先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索引的統計^⑥，全書小注中提及史實出自日曆的就達九百五十九處之多，爲全書引用書目之冠。而會要則僅爲八十二處。另有實錄五十六處。故付出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指揮稱李心傳「纂輯科條，編年記載，專以日曆、會要爲本」。其中并未提及高宗朝國史。蓋南宋高、孝、光、寧四朝國史，在宋理宗淳祐二年（一二四二）才完成帝紀^⑦，距李心傳辭世僅二年，李心傳生前未及得見。且繫年要錄一書完成於嘉定元年（一二〇八）之前，李心傳當時并無從參閱^⑧。故四庫提要的提法是錯誤的。

至於李心傳所參據的私家野史，提要所言有「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狀、案牘奏議、百司題名，無不臚採異同，以待後來論定」之記載，語之則甚確。其中參據最多的當屬熊克所著中興紀事本末一書，在此書中是名為中興小曆的^⑨。據索引統計，全書共引用五百三十一處。小曆一書，成於孝宗末年，全書亦以中興日曆為主要依據，間引私家著述以證成之。其記載高宗一朝史，記事以編年體為主，輔以紀事本末體，故李心傳寫作要錄時，凡小曆的記事無誤者，必全文引用到本書中。至其所考記事失誤處，則多於小注中予以駁正。

李心傳所引用的其他書目，大致在四五百種之間，除一部分公文案牘外，多為私家野史。而引用稍多的還有趙姓之中興遺史、朱勝非的秀水閑居錄、王明清的揮塵錄以及林泉野記和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從二百餘處到數十處不等。

關於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書的內容和學術價值，四庫全書提要并未做出全面評價。李心傳在序朝野雜記甲集時所指出的「渡江以來，紀載未備，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將之行事猶鬱而未彰。至於七十年間，兵戎財賦之源流，禮樂制度之因革，有司之傳，往往失墜，甚可惜也」諸語，應是最好的概括。這裏也不再過多予以討論。四庫提要認為本書「文雖繁而不病其冗，論雖歧而不病其雜，在宋人諸野史中，最足以資考證」語，也十分精到確當。而且，對於本書的不足之處，提要徵引宋史李心傳本傳的話，對李心傳以蜀人常重川蜀而薄東南的批評予以駁斥，舉張浚的記事為例，認為李心傳未嘗對張浚稍為回護。我也可以另舉一事，即李心傳記述紹興末年的宋金采石磯之戰中，對同樣是蜀人的虞允文，詳盡引錄時人的不同記述，也并未回護虞允